

●
解洪祥



鲁迅的 人际艺术

独特的精神历程
罕见的精神结构



山東大學出版社

鲁迅的艺术世界

解洪祥 主编

鲁迅的人际艺术

解洪祥

山东大学出版社

鲁迅的艺术世界
鲁迅的人际艺术
解洪祥

责任编辑 关 耳
封面设计 牛 均
内版设计 赵 岩
责任校对 张 萍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7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7001—9500 册
ISBN 7-5607-1542-7/B·71

定价：9.00 元

前 言

——水、乳和油

鲁迅一生，做文，做事，做人。做文有做文的艺术，做事有做事的艺术，做人有做人的艺术。鲁迅做人的艺术，大概就是所谓鲁迅的人际艺术吧。——这样说，即使不怎么严密，不怎么准确，却也大差不差的，我想。

我就是基于这种“不怎么严密，不怎么准确”的，“大差不差”的理解，来写《鲁迅的人际艺术》这本书的。

开始，我是很有点自信，也很有点野心的。因为，单是讲课，讲“鲁迅研究”课，给本科生讲，给研究生讲，给校内班讲，给校外班讲，前前后后，加起来，少说也有十多次，十来年。十多次，不算多，可也不算少。十来年，不算长，可也不算短。所以，对于鲁迅，尽管不敢说有什么了不起的系统的见解，但看法、感受，总是有一点的。我的自信，就源于、基于这“一点”。而且，我打算把这一点看法、感受，和实际材料，和许许多多

的鲁迅如何做人的生动的实际材料结合起来，融合起来，就像把水和乳交融起来一样，在这种“交融”里见出鲁迅的全人。——这就是我开始的一点打算，一点野心。

可是，真的写起来了，才发现，“交融”是很难的一件事。

比如，我有这样一种看法：鲁迅一生，既有痛苦的煎熬，又有超越的快慰。鲁迅，是一个少有的痛苦的精灵。他的一生，大半是浸泡在痛苦的酒浆里。这痛苦，既来自社会，来自社会的历史的、精神文化的、种种出人意料而一时又无力把握、无力解释的变化；又来自个人、家庭，来自不幸的婚姻。谁能想到，1906年，在绍兴，在新婚之夜，鲁迅竟哭湿了枕巾，枕巾又染青了鲁迅的脸庞？之后，10年，8年，以至更长，婚后的鲁迅，实际上一直煎熬在独身的精神炼狱里，天昏，地暗，苦雨，凄风。哪里有什么爱情？哪里有什么青春？“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实际上，鲁迅，鲁迅一生的幸福，全被那个社会吃掉了。鲁迅的经历，鲁迅的痛苦，使鲁迅痛切地感到：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实在是一个吃人的社会！《狂人日记》实际是这样一种切肤之痛的幻化。——鲁迅的痛苦，鲁迅的被痛苦的酒浆浸透了的心，我是看到了，感到了，在本书里，我也说出了；然而，却“写”不出，画不出，“写”不出和画不出鲁迅那心的抽搐。对于鲁迅精神上的这种痛苦，长期以来，人们不愿承认，不愿正视，

更不愿谈论和分析。好像，承认了，正视了，就损害了鲁迅的形象。其实，哪有这回事？怎么会呢？分明存在的东西，干嘛不敢承认？不敢分析？但是，鲁迅毕竟实现了超越，从文化思想，到个人生活，毕竟实现了超越。当然，实现了超越并不意味着鲁迅就没有了痛苦。但鲁迅毕竟尝到了超越的快慰和欢欣。这种快慰和欢欣，我同样看到了，感到了，在本书里，我也说出了。然而，同样“写”不出，画不出。“写”不出和画不出超越后的鲁迅，“写”不出鲁迅的阳光样的温暖和春风样的和煦；“写”不出鲁迅的和谐与快乐。看到了，固是一种发现，固有发现的愉快；但“写”不出，画不出，表现不出，却着实有点憋闷。

又比如，本书并不认为鲁迅的特点，如有的同志所说，只在《野草》，只在《野草》、《彷徨》所体现的现代文化意识；而认为，后期鲁迅，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同样有，甚或更有自己的特点。

传统观点认为，鲁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在于他的坚定和成熟；在于他的马克思主义不像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来自书本，而是有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广阔的生活阅历这样深厚的物质性基础。本书同意这种观点，同时认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两大精神性的基础：一是近代人本主义，近代启蒙主义理性，即近代文化思想意识；一是现代新人本主义，现

代非理性主义，即现代派文化思想意识。由于有了近代人本主义，近代启蒙主义理性，由于受过近代文化思想意识的充分的浸染，浸润，就使鲁迅和中国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有了明显的区别。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因为（建国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贫弱和（建国后）商品经济的匮乏，在中国，近代人本主义，近代启蒙主义理性，一直不怎么发展。这就使中国不少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直接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则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这一基础和特点使鲁迅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众所周知，从思想渊源上说，马克思主义是由人类近代文化思想直接发展而来的。由于有了现代新人本主义，现代非理性主义，由于受过现代文化思想意识的充分的浸染，浸润，由于把现代文化思想意识的有益成份改造、提高并溶入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得鲁迅的马克思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又有了自己的某些特色。因为，同样如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科学地批判并充分地吸收了近代文化的合理成份，却没有来得及对现代派文化做同样的工作。后来，列宁也没有做。再后来，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做。而鲁迅，是做了这项工作的。对于如何从现代派文化意识汲取营养以丰富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鲁迅做了开拓性的有益的也可以说是成功的尝

试。这一切，就使得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有了自己的非常明显、突出的特点，使得鲁迅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个罕见的思想典型。

当然，对于鲁迅，还有别的一些看法，本书也都有所涉及。

我原本有一个很得意的打算：把这些看法做为“乳”，把鲁迅人际方面的材料做为“水”，然后把“乳”和“水”交融起来，写成《鲁迅的人际艺术》。

主意拿定，我就开始了紧张的行动。第一步，当然是找材料。我从《鲁迅全集》里找，从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4卷本《鲁迅年谱》里找，从薛绶之先生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5辑6大本）里找，从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里找……找来找去，找了一大堆。之后，是酝酿，是构思，是写作。写作过程中，开始还好，还有自信，也有兴味。但越写越感到困难了，最后，写完了，我才发现：“乳”，变成了“油”，自然不会“交融”的了。于是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堆材料里，夹杂着几个观点；一湾清水里，漂浮着几点油花。满怀梦幻地写了一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竟是这样一副模样！这，谁能想得到呢？

作 者

1993年6月于山东大学南院

目 录

前言

一、爱的大纛	(1)
1. 爱的照耀	(4)
2. 爱的顾忌	(92)
3. 爱的自责	(134)
4. 爱的牺牲	(148)
二、义不容情	(164)
1. 鲁迅与陈独秀	(165)
2. 鲁迅与李秉中	(174)
3. 鲁迅与林语堂	(181)
三、“略小节而取其大”	(188)
1. 鲁迅与郭沫若	(189)
2. 鲁迅与成仿吾	(199)
四、尊师与重道	(215)
1. 鲁迅与寿镜吾	(216)
2.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	(224)

3. 鲁迅与章太炎	(230)
五、党的一名小兵.....	(247)
1. 党的一名小兵	(247)
2. 坚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	(282)
3. 党的一个普通工作者	(285)
4. 挺身而出	(289)
5. 鞠躬尽瘁	(291)
六、“风沙中的大建筑”	(294)
1. “概不赴宴”	(299)
2. 怒向刀丛	(301)
3. 辉煌的瞬间	(304)

一、爱的大纛

据鲁迅的同乡、好友许寿裳回忆，1902年，也就是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一年，他们每每谈及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见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怀亡友鲁迅》）

从此，诚与爱的问题，特别是爱的问题，便成为鲁迅所热切关注的问题。

“五四”时期，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又集中谈到爱的问题：“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做起，解放了后来的人……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当然，因为该文谈的是家庭问题，父母与子女问题，所以，这里所谓“爱”，不是特指的，狭义的。其实，从鲁迅后来的大量的言论和行动看，鲁迅的所谓“爱”，也就是鲁迅式、中国式、现代式的人道主义。

并且，我们看到，从一开始，鲁迅就没有把所谓“爱”绝对化，超验化，而是从历史，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加以考察。后来，一贯如此，更加如此。比如，鲁迅写

于1925年5月26日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又深刻地剖析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差等，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

这里，重要和深刻之处在于，鲁迅指出了中国民族缺乏爱的社会历史根源：4000年来，中国人“各不相通”。因为不相通，所以不相知，所以不相亲，不相爱。冷漠、麻木，互不关心，互不同情等等，一切精神弊端，盖出于此。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洞察和理解，所以，鲁迅一生，一贯竭力提倡“诚与爱”；并且，尤其可贵的是，鲁迅始终言行一致，身体力行。

1. 爱的照耀

鲁迅从不相信乌七八糟的乌导师，也从不以导师自居。我们热爱鲁迅，景仰鲁迅，但也大可不必把鲁迅比作照耀万物的太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鲁迅，确以自己发自心底的爱，深厚的热烈的爱，无私地、持久地、广阔地温暖着周围的人们。这种爱，这种温暖，有的人，感到了，说出了；更多的人，特别是鲁迅所谓“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那些“压在大石底下”的百姓，那些像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的百姓，却没有感到，更无从说出。

现在，是该说出的时候了！

(1) 一片真心可对月——鲁迅对劳动人民的挚爱

1932年夏秋之间，鲁迅曾在自己的寓所两次秘密会见陈赓将军。

陈赓是红军高级将领，因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组织上送他到上海治疗。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很关心苏区的情况。陈赓就给他们讲了一些红军反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战斗故事。据陈赓讲，“那些战斗的艰苦和剧烈，我们红军所表现的忠诚和勇敢，真是超乎人所能想象的，要是比起当代那些描写战争的作品所表现的，不知要超过多

少倍了。我们当时很希望人民能知道革命和红军所经受的这一切艰难和困苦。

“当时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同志，把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后来他们送给鲁迅先生看。鲁迅先生看了这些材料非常兴奋，他听说我在上海治病，便几次和冯雪峰讲，邀我到他家去谈谈。我们党也很希望鲁迅先生能把苏区的斗争反映出来，以他的才能、修养，一定可以写得好的，在政治上会起很大的宣传作用。党同意我去见鲁迅先生。”

陈赓给鲁迅介绍了苏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红军反“围剿”的情况。据楼适夷回忆，陈赓“谈得很平静，有许多生动的叙述，鲁迅先生静静地听着，不时插进一二句话。谈到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大敌人时”，陈赓“形容了红军战士大声呐喊，勇敢投入刺杀战的情景，谈的人和听的人都兴奋起来。鲁迅先生高兴得笑了，问道：‘是这样的么？’然后点了点头说：‘先声夺人嘛！’……也谈了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故事，谈到红军司令员坐在田头和农民抽着黄烟谈家常的情状，都引起鲁迅先生很大的感兴。”陈赓介绍的另一方面的情况，是苏区翻身农民的生活和斗争。陈赓回忆说：“我记得鲁迅先生当时最关心的就是苏区的群众生活，他提了很多问题，例如苏区的土地改革。鲁迅先生是很熟悉农民的，他听到过去那些屈辱的、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都伸直腰站起来

战斗了，他是很兴奋的。他也问到地主怎样进行反抗，人民支援红军的情况。我告诉他，人民怎样亲自送子弟参加红军，那些热情的参军大会，都使鲁迅先生感到特别新鲜。”

“陈赓将军特别提到一件事，他直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晰。当他和鲁迅先生谈到苏区某些房子，在四面都开了窗子时，鲁迅先生立刻就注意了这件事，而且很高兴。鲁迅先生说：这是因为人民生活好了，已经知道居住的卫生条件，四面都开了窗子，空气一定很流通了，这是一个进步。陈赓将军说：‘就是因为鲁迅先生对这件事的特别注意，所以留给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鲁迅先生当时的兴奋和愉快，直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详见张佳邻记录、整理《陈赓将军谈和鲁迅先生的一次会见》，载《新观察》1956年第12期和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载《鲁迅回忆录》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以上两文均转引自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上，凡不注明者，均转引自该书）

从鲁迅和人民群众、特别是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的关系的角度看，以上援引的材料，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点，鲁迅对苏区翻身农民在房子四面开窗一事，特别感兴趣。另一点，当鲁迅“听到过去那些屈辱的、受压迫最深重的人们，都伸直腰起来战斗了”时，感到很兴奋。不管回忆者有意无意，以上两点

似乎正好回应和证实了早年鲁迅对农民群众的基本态度：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水火中的农民是哀其不幸的。闰土，少年时代，是怎样的活泼、茁壮，在海天一色的沙地里，宛若破土而出的幼芽。但是，岁月流逝，“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故乡》）祥林嫂，勤劳，善良，安分，最低微的生活都能使她感到满足：在鲁四老爷家里，她“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到年底，扫尘，洗地，宰鹅，彻底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中国这个吃人的筵宴，连这最起码的人的权利也不给她，终于使丧夫失子的祥林嫂孤苦伶仃地倒在祝福的爆竹声里（《祝福》）。还有，《明天》里的单四嫂子，《离婚》中的爱姑……尽管具体情景各有不同，但是命运却是同一的：被吃。

对于中国劳动妇女、劳苦大众被吃的这种命运，鲁迅先生曾经幻化为一个怵目惊心的意象，这就是人们熟